

重构黑人女性身份 再现自我化过程

——《宠儿》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

王 婷, 石云龙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6)

摘要: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研究小说《宠儿》, 通过分析莫里森笔下遭受性别歧视及种族歧视双重压迫的黑人女性悲惨命运, 探讨黑人女性无身份、无自主权的边缘化状态, 揭示了对黑人女性的身份建构思想, 即只有重新书写黑人历史、黑人女性自我意识得到觉醒、自我得以回归、自我身份得到重构, 才能摆脱种族主义及性别主义的双重压迫现状。

关键词: 《宠儿》; 后殖民女性主义; 黑人女性; 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204(2011)06-0083-05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of Black Female Representation of Selfhood

——A Study of BELO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Feminism

Wang Ting, Shi Yunl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 Toni Morrison's *Beloved* is studied he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feminism. By discussing the miserable fate of black females under sexism and racism, analyzing their marginalized state—living without identity or human rights, and exploring Morrison's thoughts on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black females, the thesis demonstrates the writer's idea that black females could be rid of the double oppression from racism and sexism only when their history would be rewritten, their self-awareness aroused, their selfhood returned and their self-identity reconstructed.

Key words: BELOVED; Post-colonial Feminism; black female; identity construction

一、引言

美国著名黑人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 (Toni Morrison) 在当今美国文坛享有声誉, “作为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惟一黑人女性得主, 为 20 世纪美国文学树起了又一座丰碑”^[1]。莫里森自 1993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 立即引起国内外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 莫里森更是成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美国文化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其代表作《宠儿》被公认为是莫里森最成功、最经典的小说。到目前为止, 对《宠儿》的探讨涉及小说有争议的主题、诗歌般的语言、人物塑造、象征手法和叙事手法等的探究。现实主义、女性主义、结构

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等学派也纷纷从中找到佐证材料。

学者们对莫里森作品的解读大多从女性主义方向出发, 探讨黑人女性的自我价值和自我身份等问题, 后又转向从黑人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研究。近年来, 莫里森作品中的后殖民思想已引起学界重视, 取得一些开拓性研究^[2-5]。然而, 莫里森作为非裔美国黑人女作家, 承受着多重压力, 其作品中流露出的复杂情怀和难解之谜并未完全得以诠释, 系统与深入研究仍有待开展。文章以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为支撑, 借助相关研究成果, 对小说《宠儿》进行再研究, 揭示莫里森笔下遭受性别歧视及种族歧视双重压迫的黑人女性的悲惨命运, 指出造成这种命运的历史及现实根源即父权观念与殖民

收稿日期: 2010-10-18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9SJD750013)

作者简介: 王婷 (1986—), 女, 山西阳泉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压迫,强调非裔黑人女性在性别、种族双重压抑下寻回自己声音和主体性的努力,探讨莫里森对黑人女性的身份建构思想,再现黑人女性从边缘化的“他者”形象逐渐转变为“自我”的动态过程。

二、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

后殖民女性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第三世界女性,研究者将性别问题与种族问题联结起来,着重考虑第三世界女性的特殊性,为其利益抗争。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曾谈到“学者们常常将第三世界妇女定位于欠发达、受压迫、没受过教育、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亚洲、非洲、中东及拉丁美洲国家”^[6],相对于自诩为现代、受过教育、能控制自己性和身体、自主决策的西方女性而言,第三世界妇女往往被认为是无知、贫困、没受过教育、受传统束缚、以家庭为本、在性方面受制约、始终作为牺牲品的女性。同时,批评家们也认识到人们对第三世界女性的这种认知具有历史和现实根源,指出世界范围内“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侵略是以男权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性别歧视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狼狈为奸……”^[7]她们揭露了性别歧视和殖民主义把第三世界妇女建构为他者的事实,使其在历史上受到双重的压制。关于“他者”,波伏娃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8]。波伏娃的“他者”,原意只用于诠释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关系,意在揭露男性主宰下女性的从属地位,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后殖民女性主义中“他者”意义的解读,这里“他者”不仅是处于男性从属地位的女性他者,还是处于白人从属地位的种族他者,而在小说《宠儿》中,莫里森正是塑造了塞丝这样一个双重他者形象,试图向人类展现遭受性别和种族双重歧视的黑人女性的悲惨遭遇,寄托她对黑人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同时也表达出对男性中心主义及白人中心主义的愤懑。

对于非裔黑人女性来说,她们可悲的是不仅落入奴隶制和白人种族主义的桎梏,而且遭受本族男性的压制。在男权社会里,男性处于不可替代的位置,他们“代表一家之主,保护妻小,制定法律,捍卫文化”^[9]。在《宠儿》中,几乎所有黑人男性都处于缺席状态,黑尔、西克索、保罗 A 及保罗 F 都只显现在塞丝的记忆中,从未真正出场,惟一在场黑人男性就是保罗 D。表面看来,莫里森塑造的是一个完全

由贝比·萨格斯、塞丝、丹芙及宠儿等黑人女性主导的黑人民族,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只有保罗一个黑人男性,黑人女性却仍承受着来自本族男性的压力。贝比·萨格斯过世后,只有塞丝及女儿丹芙住在蓝石路的 124 号。那里尽管“充斥着”一个婴儿的怨毒”^[10]³,但依旧是黑人女性的世界。保罗 D 的到来,无意中填补了男性缺席的状态。他暂时充当起 124 号的男主人,通过在 124 号一阵狂摔乱砸,赶走鬼魂并在身体上占有了塞丝。由此看来,尽管是在白人压制下的黑人种族群体中,男性的中心统治地位依旧无法消除,黑人男性并没有因为同样是白人的奴隶而与黑人女性站在统一战线。其次,保罗受到宠儿诱惑时,向塞丝提出想要她怀孕。这里,其用意并非真想与塞丝结合,而只是将塞丝当作抵挡宠儿诱惑的工具。莫里森这样安排,暗示出保罗作为男性独特的占有欲及优越感,因为让塞丝怀孕无意中透露出男权社会下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无论是母亲还是孩子,都将隶属于男性的权威之下,成为男性的附属品。

塞丝逃离“甜蜜之家”后去了黑人聚居地。那里,黑人种族组建起自己的城镇,避开白人种族对黑人的控制,远离他们的歧视与压迫。然而,在这个白人缺席的地方,白人文化的侵蚀却无时无刻不在场。黑人曾被奴役受压迫,但令人悲哀的是,他们在身体获得解放后竟然认同了“白人至上主义”,认同了黑人的从属地位。尽管塞丝义无反顾地逃离“甜蜜之家”,同黑人男性一样反抗白人奴隶主的奴役,甚至杀死自己的女儿以宣示黑人种族意识,可是,肤色同一性并不能消解父权观念下女性的客体地位,在黑人占主流的黑人聚居地,塞丝杀女被捕的惨剧同样得不到黑人群体的关心与同情,换来的却是黑人的鄙夷、嫉恨与唾弃,甚至连保罗也不例外。他从斯坦普处得知杀婴事件后,毅然离开了塞丝。小说中,莫里森通过描述黑人群体甚至保罗对塞丝的鄙夷与无情,清楚地暗示出塞丝作为黑人女性生存的艰难,同时表达了她对黑人男性乃至整个黑人民族身份的怀疑:他们生活在自己的聚居地,却无形中按照白人的规则做事,将压迫强加在处于黑人男性“他者”地位的黑人女性身上,使其承受双重的歧视和压制。

塞丝亲手杀死亲生女儿,这对母亲来说是何等残忍。莫里森设计塞丝杀女而非杀子,其间蕴意不言而喻:在男权社会里,未成年男孩比女孩地位重要,牺牲女儿突出的是黑人社会男性中心、女性附属的生存状态;其次,该情节为塞丝提供了一条替女儿解除后顾之忧的道路。面对白人追逐,莫里森赋予

塞丝一种权利,让其帮助女儿摆脱沦为奴隶制牺牲品的结局,因为她意识到女儿是潜在的“母亲”,帮她选择死亡也是为其逃脱最终沦为父权制社会牺牲品的命运。这里,作者试图让一个普通黑人母亲出于“厚重的爱”在自由还是死亡面前替女儿作出抉择。她不仅在向残忍的奴隶制,更是对男权中心发出诘问,为什么女性总是被压迫,总是被置于男性的从属地位?这里,塞丝杀婴这种极端行为成了奴隶制逼迫黑人人性泯灭的后果,是男权中心主义所酿造的不幸结局,也是塞丝为保护后代付出的巨大代价。

然而,处于边缘地位的黑人女性,不仅要面对来自本族男权的压力,更可悲的是同黑人男性一样,必须面对来自处于中心地位的白人种族歧视。艾勒克·博埃默早在其《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提到:“殖民地的妇女,却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被双重或三重地边缘化。她们的低人一等不仅仅是因为性别,还因为种族、社会阶级……”^[11]在小说的扉页中,莫里森用“六千万甚至更多”作为引语,指的就是数百年来黑人在被掳掠到美洲过程中丧生的人数。这在一定程度上昭示出小说的主题,祭奠丧生的黑人同胞,揭露奴隶制的残酷实质,表达出作者一直以来对种族问题的深切关注。在种族主义压迫下,黑人女性不仅要遭受白人施行的身体政治,还要遭受白人无形中施加的精神摧残,她们无身份、无地位,即使在奴隶制消除百余年后,仍旧无法摆脱记忆中的阴影。

在奴隶制下,黑人女性同黑人男性一样,首先承受的是白人奴隶主施行的身体暴力。无论在哪里,白人奴隶主均可以肆无忌惮地对黑人女性进行杀戮、戕害和玷污。在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也是身体暴力。莫里森最为关注的是黑人女性身上的创伤:塞丝母亲身上的记号、塞丝后背上的“樱桃树”、宠儿脖子上的伤痕等。黑人女性是悲哀的,塞丝不停地被白人侵犯,还要遭受白人的责罚:“‘学校老师’让一个家伙划开我的后背,伤口愈合时就成了一棵树”^{[10]17}。树干“通红通红的,朝外翻开,尽是汁儿……还有树叶……”^{[10]79}在白人姑娘眼里,那是一颗树,被美化了的树,可在塞丝心里,那是遭到毒打后留下的伤口,是白人奴隶主欺凌黑人女性留下的罪证。这里,莫里森通过身体再现历史,试图找回黑人女性的自我身份与自主权。黑人女性除了遭受毒打外,还要遭受白人的性暴力,忍受白人奴隶主的百般欺凌,充当白人满足性欲或繁殖人口的工具。艾拉便是这样的典型,虽然莫里森在小说中对艾拉着墨

不多,但那白人父子将她锁在屋子里肆意欺凌的情形,彰显出作者的深刻用意:艾拉那骇人经历并非个案,它突出表现了奴隶制下黑人女性的不幸,揭示出白人种族的兽行,体现出作者对黑人女性主动找寻身体的自主权及性选择权所寄予的关怀、支持与鼓励。

长期的奴隶制统治不仅使黑人女性在精神上遭受摧残。黑人的话语权掌控在白人奴隶主手里,黑人女性乃至整个黑民族都被剥夺了话语权,甚至自己的语言也被禁止。对于黑人来说,“争取到发言权是为自由奋斗的必要部分,对那些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开端,是朝向自由迈进的一步”^[12]。没有发言权,就没有自由。贝比在获得自由之前只能使用并接受白人奴隶主给自己的名字;塞丝压根就不记得母亲曾经使用过的语言;丹芙只能站在教室外面,踮起脚趴在窗台往里偷看;塞丝惟一一次讲话,也惨遭白人奴隶主毒打报复,差点丢掉性命,因为主人始终认为“定义属于下定义的人——而不是被定义的人”^{[10]190}。由此看来,隐含在话语中的种族压迫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黑人女性,心理上的阴影使她们在奴隶制消除百余年后仍无法安心生活。贝比认识到“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哪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黑人死鬼的悲伤”^{[10]17};塞丝同样痛苦地生活在过去不堪回首的记忆里,不想提起过去、讲述过去;即使是作为新一代黑人女性的丹芙,也由于历史原因而生活在逃避、迷失中,她“不知道去哪儿、干什么”^{[10]14},没有人与她说话,无论男孩、女孩都不喜欢她。黑人女作家莫里森清楚地意识到种族压迫力量的强大。在她笔下,贝比、塞丝等成了无数镜子,映射出黑人女性的痛苦经历,揭示出她们的悲惨命运。

然而,莫里森在作品中所表现的黑人女性无身份、无自主权、教育缺失、没有话语权的悲惨命运,根本原因在于男性中心、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作者将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性、颠覆性、边缘性的精神同黑人女性所遭受双重压迫的经历结合起来,旨在强调黑人女性以及黑民族若想找回自我身份及自主权,必须揭露西方白人文化中心论,解构男权中心体系,唤醒黑人女性自我意识,对自我身份进行自我建构。

三、黑人女性的身份重构

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是福柯的“权力-话语”和文化身份确立问题,她们认为话

语权和身份,如同性别,是第三世界女性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莫里森作为非裔黑人女性,身处边缘化的“他者”地位,既要面对传统文化的性别歧视,还要面对主流文化对少数族裔的种族歧视,在两种文化中她都很难找到归属感,因而重塑文化身份与女性自我认同则十分必要,因为“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13]。因而,重构黑人女性身份并不是对过去的纯粹恢复,而是在变化中重新定位,认识自我。

那么,莫里森是如何重构黑人女性身份的呢?不难发现,莫里森借鉴了后殖民女性主义思想。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斯皮瓦克对如何重新书写自己的文化身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强调“后殖民批评的人文话语”及“后殖民批评中的第三世界妇女的‘发言’”^[14]。莫里森作为非裔女作家,为第三世界女性代言,她不仅要反思美国奴隶制的历史,反思传统社会的父权制观念,而且要予以改写,改写被主流历史观所忽视与边缘化的黑人女性历史,还原黑人女性的生存状态。在莫里森看来,这是当代黑人女性确立自己身份的必要过程。在小说中,莫里森试图通过重新书写黑人女性历史,塑造塞丝自我意识的觉醒到自我回归的历程,来实现其重构黑人女性身份的愿望,表现其对黑人文化及黑人女性文化身份的强烈诉求,再现黑人女性从边缘化的“他者”逐渐转变的“自我”化过程。

莫里森的重新书写历史试图通过重构历史,解构权威性叙事手法来实现。曾有学者认为:“莫里森的《宠儿》是一个精心安排踌躇满志的探索历程,以求填补历史上被忽视部分的空白,记录被遗忘者和被轻视者的日常生活。”^[15]作者在解构中重构,目的在于在形式意义上构建非洲黑人女性身份。小说中作者没有采用历时方法、线性结构,没有从“学校老师”或其他白人视角叙述黑人历史,而是主要从塞丝、丹芙及宠儿等黑人女性的视角来审视所发生的一切。她采用多视角、多层面、时空交叉的方法,向人们重现过去奴隶制下的惨痛记忆,展示黑人女性在种族主义和父权观念双重压迫下的悲惨境遇,号召黑人女性自我觉醒,找回自我。小说的3部分各代表一个发展阶段,许多倒叙穿插其中,时间不同,长短不一,有的向后退回半个多世纪,有的只是回顾当时发生在不同人物身上同一时刻的事件。这样,莫里森把不同的声音组合起来,构筑成不同的人物形象。形式上片段化、时间上缺少衔接,莫里森运

用这些叙述技巧,无形中正是对传统写实主义统一叙述视角的反叛,也是对过去男性叙述权威的挑战。因此,《宠儿》的“叙述方式不仅是作者社会责任感的具象化,蕴涵着历史的沉重,同时还包含着她对公众心理承受能力的体恤,抑或还隐藏着她本人对人物心理的认同”^[16]。这样,一个原本在历史上被剥夺了话语权力的黑人民族,在莫里森梳理和重述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如果说莫里森重新书写黑人女性历史只是形式的反叛与挑战,那么,塞丝自我意识觉醒到自我回归的自我化历程则是作者黑人女性身份构建思想内容上的充实。莫里森坚称自己是“黑人女作家”：“身为黑人和女性,我能够进入到那些非黑人、非女性者所不能进入的情感与感受的广阔领域。”^{[10]iii}这一身份是莫里森试图打破弱势群体沉默处境,修正和消解语言暴力的有利凭借。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以现代艺术和人性的光芒实现对诸如黑人妇女这样的双重(多重)弱势群体的观照与关怀,为他们及其心灵作史。”^{[10]iii}因而,莫里森在作品中选择遭受种族与性别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作为代言人,承担着寻找自我,重塑自我身份的重任,这样,一个长期“失语”的民族从仿佛失去理智的黑人女性身上获得自己的声音和性格,这是莫里森对黑人女性身份建构思想深层意义上的体现。

黑人女性在历史上长期受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双重压迫,不会也不可能立即觉醒,找寻自我,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艰难的历程。塞丝,一个黑人女性,是如何成功地找寻自我,实现自我化过程呢?首先,“属性”事件是塞丝自我意识觉醒的开端。她在听到“学校教师”叫侄子们分别罗列人的属性和动物的属性时,潜意识中感到了不安;在加纳太太告诉她属性的含义时,她觉得受到了侮辱。塞丝意识到,在与动物的比照下,自己拥有人的属性,却被当作动物来看待,显然她无法忍受。其次,塞丝的奶水被抢事件激化了塞丝自我意识的觉醒。她选择依靠自己逃离饱受种族主义歧视和性别主义压迫的所谓“甜蜜之家”。对于塞丝——一位有着生育能力的黑奴母亲来说,出逃意味着黑人女性追寻自己身体和心理自由的强烈愿望。最后,塞丝的“杀婴”事件迫使其自我意识趋于极端,这是塞丝作为奴隶母亲在奴隶制社会下所能实行的最无助也是最强烈的反抗方式。莫里森通过赋予塞丝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其对种族主义及性别主义进行反抗,从而构筑黑人女性自我文化身份,然而,这种反抗必然要经受重重阻碍,付出巨大的代价。

经历了奴隶制度的残酷蹂躏,塞丝对自己种族的理解只有沉重与屈辱,面对宠儿的归来,她试图尽全力弥补自己当年杀死宠儿的愧疚感,最终身心疲惫,心力交瘁,精神处于崩溃状态。可以说,塞丝是美国社会内部殖民统治的直接受害者,她对自己的种族身份充满焦虑和恐惧,背负着种族沉重而屈辱的历史不能自拔。小说结尾,斯坦普牵着马过来时,塞丝的第一反应仍是“不。不不。不不不”^{[10]262}。由此看来,“对抗并不够,在个人反抗之后留下的空白之处仍有自治的必要——铸造崭新的自我”^[17]。这里“铸造崭新的自我”在莫里森看来是黑人女性自我的回归:认识到自我才是最宝贵,最重要的。当塞丝最终趋向精神崩溃时,莫里森借保罗之口,向塞丝,更是向众多的黑人女性传达了自我价值,“我们拥有的昨天比谁都多,我们需要一种明天”,“自己才是最宝贵的”^{[10]273}。保罗道出了黑人女性生存的根本:“只有拥有自我,才能战胜历史遗留的创伤。塞丝的质疑“我?我?”^{[10]273}这清楚地表明,她开始真真切切地认识到自我的重要,意识到自我回归的真正意义。她已不再是被内心创伤所麻痹的沉睡者,而是主体性回归、身份得到认可的黑人女性,而只有此时,塞丝作为黑人女性自我化才得以真正实现。同时,莫里森在重构黑人女性身份的过程中也暗示出当今第三世界女性的出路,只有黑人女性自我意识得到觉醒,自我身份得到重构,才能摆脱种族主义及性别主义的双重压迫现状。

四、结论

在小说《宠儿》中,莫里森通过描述遭受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的悲惨命运,将批判矛头直指男性中心主义及白人中心主义,以其独到的写作手法揭示出黑人女性在解放过程中对自我身份的诉求,表达了莫里森对黑人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渗透出其重构黑人女性身份,再现自我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思想。在小说中,她对后殖民语境下边缘女性主体身份的忧虑与思考,对第三世界女性生存状态的担忧,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讨在当今世界仍具有普遍意义和社会价值,值得人们

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 [1] 王守仁,吴新云. 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前言页1.
- [2] Barbara J Wilcots. Rescuing history: Faulkner, Garcia Marquez, and Morrison as post-colonial writers of the Americas[D]. Denver: University of Denver, 1995.
- [3] Hanan Abdullatif. Toni Morrison: rethinking the past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D]. Kingston: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1999.
- [4] Mary Jane Suero Elliott. Postcolonial experience in a domestic context: commodified subjectivity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J]. *Melus*, 2000(3/4): 181-202.
- [5] 杨劫. 流放与抗争的历史文本——从后殖民视域下看《宠儿》中的身体政治[J]. *名作欣赏*, 2007(9): 94-98.
- [6] Chandra Mohanty. Cartographies of struggle: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C] // Chandra Mohanty, Ann Russo, Lourdes Torre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5.
- [7] 林树明. 性别意识与族群政治的复杂纠葛: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J]. *外国文学研究*, 2002(3): 16.
- [8]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4.
- [9] Mary Paniccia Carden. Models of memory and romance: the dual endings of Toni Morrison's *Beloved*[J].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1999: 404.
- [10] Toni Morrison. *Beloved*[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11] Elleke Boehmer. Colonial & postcolonial literature[M]. 盛宁,韩敏中,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57.
- [12] Bell Hooks. *Talking back, thinking feminist, thinking black*[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9: 18.
- [13] 斯图亚特·霍尔. 文化身份和族裔散居[M] // 罗钢,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11.
- [14]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25.
- [15] Kimberly Chabot Davis. "Postmodern blackness": Toni Morrison's *Beloved* and the end of history[J].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1998(2): 245.
- [16] 陈法春. 于迂回中言惨不堪言之事——《娇女》叙述手法的心理意义[J]. *国外文学*, 2000(3): 80.
- [17] Bell Hooks. 革命的黑人女性:使我们自己成为主体[M] // 罗钢,刘象愚.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04.